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

□王慧博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摘要: 本文概述了大众文化的产生, 比较了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文化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异同点, 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大众文化产生的影响及在该影响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 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学派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06) 03-0169-02

随着大众文化的的历史发展, 东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 由于探讨和研究的层面与所取的视角不同, 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流派, 它们之间的论争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 而且还直接影响了政府机构和消费者主体对大众文化普及采取的政策和态度。

一、引言: 大众文化的产生

在对大众文化发展历史及其性质的研究中, 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就已指出, 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在《启蒙辩证法》中,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首先使用了这一新概念, 意指战后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娱乐和大众传媒变成了工业, 在推销商品的同时操纵了大众的意识。他们认为, 在机械复制时代和工业社会中, 物质和文化产品被认为没有真正的区别, 汽车的生产 and 电影的生产一样是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所决定。大众文化的标准化程式化以及产品的机械复制被认为是刻板、琐碎和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是文化商品化以后的必然结果^①。在这种文化的强大影响下, 民众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 成为一种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资本凭借自己的实力控制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这就导致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文化工业的出现。法兰克福

学派创立了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 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许多本质方面。

各种大众形式的消费开始为民众所享有, 同时也逐渐瓦解人们的反抗意识, 这种“消费控制”加强了对大众的奴役和对人性的压抑。该学派理论认为, 现代艺术也以异化的形式加强对人的心理、意识、意志的操纵。这一批判理论的影响在日后扩大到了整个欧洲, 特别是19世纪50年代之后, 它直接影响了文化研究学派并促使英国新左派(英国文化学派)理论家群体的形成。

二、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的异同比较

英国文化学派的兴起。新左派是19世纪50年代末由一批英国前共产党知识分子、左翼文化人以及激进的大学生结合而成的政治运动的成员。新左派与大众文化研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左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些重要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有明显的区别。

英国文化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同比较。从英国文化学派的兴起可以看出,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法兰克福文化理论学派的关系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不容否认,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阐述和批判成果影响深远, 并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不同的是, 文化研究

学派抛弃了文化工业分析中的机械成分, 注重从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角度来考察和分析大众文化, 而不是对大众文化采取拒斥的态度。

法兰克福学派出于对意识形态批判立场, 把批判指向定位在资本主义文化对于大众意识的控制方面, 大众被看成被动的客体, 忽略大众对文化的积极反应。英国的文化研究理论学派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中隐含的能动力量。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文化产品的生产, 但可以控制它的消费。从这一点来看, 文化商品不仅是消极接受的对象, 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如英国文化研究的首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斯和霍尔, 他们不只是站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立场, 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 而且同时从平民主义和大众立场出发, 去发现民众参与和对话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认为, 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二分法失之简单, 而且也不是对当下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明智反应。在他们看来, 大众文化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 它具有沟通、交流及促进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积极功能。因而, 他们主张解构精英——大众文化或雅俗文化间的二元对立, 提升大众文化的地位, 倡导建立“共同文化”, 让社会文化在雅俗共赏中得到整体水平的提高。

现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的色彩,传播学学者重点研究它与传媒的关系,社会学者则强调它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文化学者关注的是它与精英文化及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真正的多维视野,把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大众文化的错位

20世纪90年代,面对中国大众文化的潮涌,不少知识分子忧虑重重,各种文化批判应运而生,但这并不构成机械照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理由。因为“大众文化”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环境中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义也非常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移植到现代中国,至少有四种“错位”需要我们重新改造创新。

第一,今日中国的大众传媒格局与二战刚结束时相比已经相去甚远。技术的进步导致文化传播的便捷化与文化信息的极度丰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传播学揭示了接受者在传播过程中具有积极主动特性,大众是主动而有选择地接受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则往往以精英主义看待大众文化现象,所以会忽视大众接受文化过程中的主动性与批判性。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所产生的社会与今日中国在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生产方式、政治经济结构上都有巨大的错位。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是在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西欧得以发展的,与今日中国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形态上都必然有质的差别。中国的社会不是成熟的现代性社会,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在目前的中国政治文化仍然位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都是在政治文化的制约语境与许可范围内艰难地存在,而且呈现出与政治文化相妥协(自觉的或无可奈何的)明显倾向。

第三,法兰克福学派把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附随的大众文化的弊病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把科学技术、现代性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持极度悲观态度。孕育

大众文化的现代中国社会已是大大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第四,法兰克福学派对艺术自律性的过度强调,过分夸大了文化决定论,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理论具有明显的否定日常生活、脱离广大公众社会实践的倾向,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2]。他们一味地推崇精神,否弃物质,鄙视大众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表现出十足的贵族精英倾向。

四、大众文化的特性

1. 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宽容性及丰富性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旨在使大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尽管有色情化、暴力化以及套式化倾向,但是,它是当代大众社会的必然产物,有其在生理、心理、文化、社会诸方面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大众文化对感性欲望的刺激与满足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促使人们从神圣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归^[3]。

大众文化以其开放性、宽容性及丰富性创造了一种共享文化空间,彻底打破了过去文化的封闭性、狭隘性、单一性。大众文化是大众参与社会和支配文化的一种重要渠道。它契合大众趣味,有利于大众参与社会文化生活,抗拒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家长专制成分,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

由于大众传媒的形式和内容不同,大众文化产品也异常丰富多彩、并行不悖。这样,社会文化产品丰富多彩,既可以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纯粹的精英文化,又可以有娱乐的大众文化、一次性消费文化。各种文化产品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尽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

2. 大众文化在现代中国的特性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发展图景中的文化关系。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产生了大量的都市居民,民众生活普遍改善,许多社会文化上的禁忌和民主政治的障碍逐

步去除。因此,大众文化就自然而然成了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

现在,大众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它不仅深入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阐释着现代生存模式的新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新的交流方式^[4]。但是,它同时也消解着大众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只追求现世生活的享乐和感性的满足,使时代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导向。

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很成熟,需要不断地推进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丰富中国的大众文化产品,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使中国由一个大众文化产品的输入国向输出国目标努力。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中国大众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大众文化是商业文化,消蚀了人的个性,使商品的利益代替一切,成为大众文化的绝对标准。

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是其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文化产业”概念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大众文化的种种负面现象,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对它的某些观念,如果我们脱离中国文化的具体语境,盲目地追随和蹩脚地模仿,对中国的大众文化只能是破坏大于建设,迷信多于理性,有碍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因此,中国在发展大众文化的同时,应逐步建立健全文化机制和体制,对大众文化发展因势利导,从而有利于中国大众文化在新的世纪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晓明.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J].文化研究,2002.
- [2] 陶东风.批判理论的语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 [3] 广文,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J].学海,2001,(5).
- [4] 姜华.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再认识[J].佳木斯大学学报,2001,(6).

[作者简介] 王慧博(1979-),女,河南人,现为上海大学2005级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振 胜